

DOI: 10.3969/j.issn.1672-1101.2025.05.010

杜撰“古本”行为的学术回顾与反思

——以杨慎论评唐诗为例

方 胜

(安徽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古代学者们在编、选、校书时不说明文献来源,以“原本作某(字)”“古本作某(字)”来校注、讨论典籍中的异文,或者申述自己对诗文的理解,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但有些学者所说的“古本”是杜撰而来,杨慎是其中一位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也有些学者所说的“古本”并非杜撰而来,却也受到人们的质疑,陷入学术的“塔西佗陷阱”之中。通过考察杨慎等著名学者在讨论唐诗异文时所说的诸多“古本”,可以发现因杜撰“古本”而形成的异文确实大量存在,而且这些异文往往较易为后人所采信,对古籍的阅读欣赏和整理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古本;唐诗异文;伪造;杨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25)05-0091-09

Academic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Act of Fabricating “Ancient Texts”

——take Yang Shen's Evaluation of Tang Poetry as An Example

FANG 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t was a relatively common phenomenon in ancient times that scholars did not state the source of the literature when compiling, selecting and proofreading books. They would annotate and discuss the variant texts in the classics by saying “the original version was written as a certain character” or “the ancient version was written as a certain character”, or express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poetry and prose. However, the “ancient editions” mentioned by some scholars are fabricated, and Yang Shen is a typical figure among them. Some scholars' so-called “ancient editions” are not fabricated, but they have also been questioned by people and fallen into the academic “Tacitus trap”. By examining the numerous “ancient texts” mentioned by renowned scholars such as Yang Shen when discussing the variant texts of Tang poet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indeed a large number of variant texts formed due to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texts”, and these variant texts are often more easily accep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reading, apprecia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ancient texts; different versions of Tang Poetry; fabricate; Yang Shen

收稿日期: 2025-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历代载录唐诗的金石书画作品分类整理及其文献与艺术价值研究(23BF084)

作者简介: 方胜(1977-), 男, 安徽桐城人,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清初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八论王维诗为人所改时曰:“近改前人文,动曰‘原本’,此亦学古之不可不一察者。”^{[1]2229}作为治学严谨的文献学家、文学批评家,毛奇龄敏锐地觉察到明代以降在校编、讨论前人诗文时存在着杜撰“古本”的不良学术风气,并提醒读者加以甄别,此诚有感而发^①。其实,不仅明清初如此,在不太注重“学术规范”的古代,编校书者不说明文献来源,仅以“原本作某(字)”“古本作某(字)”来校注、讨论典籍中的异文,或者申述自己对诗文的理解,是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杨慎在《升庵诗话》“书贵旧本”中列举了很多明人删减古书、窜改文字的事例,强调“旧本”可贵之处在于“可以订讹”^{[2]795};但自己却因为“好伪撰古书”^{[3]1026}而被人指责,在其身后不久就有《正杨》这样的专著问世,尤其是清代以后,诸多学者对杨慎的作伪行为大加批判。不可否认,绝大部分严谨的学者虽然没有严格说明“古本”的出处,但多是有源可溯的;然而也有一些人是藉口“古本”而发挥自己的观点,因杜撰“古本”而形成的古籍异文确实大量存在,并对后人的阅读、欣赏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以杨慎为例,谈谈学术史上杜撰古本现象的是与非,期望对这一现象作出客观评价,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杨慎杜撰“古本”平议

杨慎(1488~1559)之渊博是毋庸置疑的。《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杨)慎为第一。”^{[4]5082}即便现存著作超过杨慎的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也认为:“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5]1053}但评论者在言及其渊博的同时,几乎都会提到他的另一面:

杨慎“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3]1026}。

“(杨)慎好伪托古书”^{[3]1257}。

“(杨)慎所谓古本,何代之古本乎?”^{[3]1250}

“惟杨慎之言多不足据。《石鼓文》尚能伪造,何有于王建宫词?”^{[3]1294}

仅《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有多次提及这个问题。其他历代评论者对此更是议论不休:

胡震亨云:“近代杨升庵更好改杜诗。……用修

当年何不以推敲功改己诗,暇与此老改诗乎。”^{[6]337}

王鸣盛云:“此必升庵所伪造,而嫁名于乐史传本者。”^{[7]卷75}

钱谦益云:“杨氏诗话往往改窜伪托,以欺后人。”^{[8]卷106}

于敏中云:“此出用修作伪,不足据也。”^{[9]卷70}

阎若璩云:“知系杨氏假托”“亦系杨氏假托以自重”^{[10]卷1}。

丁福保云:“升庵渊通赅博,而落魄不检形骸,放言好伪撰古书,以自证其说。……凡此种种,皆失之伪撰。”^{[11]1252}

陈寅恪云:“鄙意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然往往伪造古书。”^{[12]1144}

凡此种种,“杨慎妄改”“用修作伪”等字眼不绝于书。那么,杨慎到底杜撰了哪些“古本”呢?

杨慎作伪可谓是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九“碑帖”《周石鼓文》云:“至杨用修云得李宾之家唐人搨本全文,恐是升庵伪造。”^{[13]卷9}《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读书敏求记》云:“《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3]745}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三下云:“正不独岵嵎之碑为杨慎伪撰,垂露诸体为梦英伪作。”^[14]后人对《石鼓文》《杂事秘辛》等讨论颇多,兹不费言。本文对杨慎所讨论的唐诗“古本”情况略作检讨,其为人所诟病者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无中生有的“古本”。杨慎云曾见古本作某,但经学者们考证,这个“古本”从来未见著录,基本可以认定属杨慎杜撰。《升庵诗话》卷五“杜牧登乐游原”条:“‘长空澹澹没孤鸿,万古消沉在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此诗诸家皆选,而首句误作‘孤鸟没’,不成句,今据善本正之。”^{[2]737}在同书“书贵旧本”中也举此例认为当作“没孤鸿”。但遍检杜牧诸本,包括景苏园影宋本、四部丛刊本、冯集梧注本,以及《万首唐人绝句》等均作“孤鸟没”,杨慎所说的“善本”不知从何而来。胡震亨《唐音统签·戊签》云:“杨用修欲改为‘没孤鸿’趁韵,误。”^{[15]56}这也许是杨慎妄改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绝句首句是无须入韵的。这是杨慎杜撰“古本”中最的一种情况。

^① 钱锺书《管锥编》(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七七条对有申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第1693页。

其二,将常见之本说成“古本”,有故弄玄虚之嫌。杨慎云:“《哭宣城善酿纪叟》,予家古本作‘夜台无李白’,此句绝妙,不但齐一生死,又且雄视幽明矣。昧者改为‘夜台无晓日’,又与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医也。”^①陈耀文《正杨》卷四“太白诗”先引述杨慎所论,再通过大段分析,认为“夜台无晓日”自有其合理之处,然后又指出此诗有不同的版本:“《李集分注》又载《题戴老酒店》云:‘戴老黄泉下,还应醉大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按此具载本集,乃云古本何耶?”^{[16]卷4}确实如此,在宋蜀刻本李白集中附列该本,现代学者詹锳先生和刘学锴先生均认为《题戴老酒店》更近旧本^{[17]807}。陈耀文以此诟病杨慎:这明明是常见之本,为什么要说是“古本”呢?实际上,杨慎此处所论完全是因袭谢枋得之语,谢枋得云:“古本作‘夜台无李白’,绝妙!不但齐一生死,又且雄视幽明矣。”^{[18]3759}而杨慎引用此诗时在标题上露出了马脚,因为此诗作‘夜台无李白’时诗题为《题戴家老店》,而不是《哭宣城善酿纪叟》,真不知是谢家之“古本”,还是杨家之“古本”!由此基本可以断定,杨慎并没有真正见到所谓的“古本”,而是照搬前人之说。

其三,借题发挥式作伪。宋代俞玉吾撰《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对朱熹、彭秀川、陈宗道等人的阐释均有所发明,受到后人好评。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十九云:“观其发挥篇末及是序所述,虽以彭氏古本为经,注混轂而于本书仍不敢有所移易,其谨慎可谓至矣。不料后来杨升庵即因其说而造伪本,云前又有同时阮登炳、张与材、杜道坚三序。”^{[19]卷69}顺着历史上已有的某种说法,借以发挥想象,编造古本,这样很容易让人相信他所说的话。借题发挥,是杨慎常用的一种手法,在唐诗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杜甫《丽人行》添加“足下何所有?红蕖罗袜穿镫银”两句,此正是顺着杜诗前面的描述发挥自己的想象臆造而成。此例前贤时哲讨论已多,不再赘述。

胡震亨《唐音癸签》中列举了很多杨慎改唐诗之例,并云:“诸家欲为此老更弦者甚众,恨无从起此老问之。”^{[6]338}可见其“恨”之切。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对杨慎也是尽情别阙指瑕,几无褒扬之语;冯班去世后,严熊作挽词二十首,其中第九、第十首专赞其

明辨杨慎之妄改,此足见后人对杨慎之不满。

二、因杜撰“古本”而形成的古籍异文

除杨慎以外,藉口“原本”“古本”“善本”来改动古书的学者也并不少见,以下略举数例。

明人郑明选《郑侯升集》卷三十一“杜甫曲江诗”记:

杜甫《曲江》诗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余尝见一古本,“风飘”作“花飘”,连用三“花”字更妙。^[20]

此即《曲江二首》之一,检历代杜诗诸刻本第二句均作“风飘”,不知郑氏所见“古本”为何本?难道是方回所撰《瀛奎律髓》?《瀛奎律髓》卷十“春日类”选杜甫此诗:“《曲江二首》:一片花飞减却春,花飘万点更愁人。”第二句出现了“花”“更”两处异文,“更”在诸本中均作“正”。方回评曰:“第一句、第二句绝妙。一片花飞且不可,况于万点乎?……但诗三用‘花’字,在老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纪昀曰:“‘老杜则可’之说,犹是压于盛名。”查良行曰:“三句连用三‘花’字,一句深一句,律诗至此,神化不测,千古那有第二人。”^{[21]358}方回对于杜诗连用三“花”赞叹不已,但他没有说明改“风”为“花”的依据,也没有说明诗歌来源;他的主张得到了查良行的赞同。但在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中出校此处异文:冯班、李光垣:“‘风’讹‘花’。”纪昀:“第二‘花’字乃别本之讹,实止两用。”^{[21]389}无论冯、李,还是纪氏,都认为方回作“花”是不恰当的。《瀛奎律髓》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年(1282),明成化三年(1467)皆春居士重新刻板印行;郑明选生卒年未详,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进士。对于郑氏而言,面世仅三百年,且明代又有新刻本问世的《瀛奎律髓》能否归属于“古本”之列,实可怀疑。如果郑明选所言非据《瀛奎律髓》,那么杜诗“古本”又是何本呢?郑明选对于“花飘”还是“风飘”的讨论,也引起了仇兆鳌的注意,其《杜诗详注》卷六在“风”下注“郑氏作花”^{[22]446},从此以后,杜诗又多了一处异文。

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三“千门”条:

王右丞诗“銮舆迥出千门柳”,用建章宫千门万户事也,“归鸿欲度千门雪”,“却望千门草色闲”,皆本此。俗本“千门”作“僊门”,谬甚。^[23]

① 此条《升庵诗话》未载,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卷35据《升庵外集》转引。

“僊”，即“仙”。此句出自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果真是王维集俗本作“千”，古本作“仙”吗？恰恰相反，王维集诸刻本、《文苑英华》等多作“仙”，仅《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全唐诗》等作“千”；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也取“仙”为正文^{[24]383}，难道焦氏以同时代李攀龙、高棅等人之选本为“古本”吗？焦氏不仅此处“谬甚”，同书同卷“元夕诗”条：

苏味道《元夕》诗：“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镗，观卧美人诗”；“落钗犹冒鬓，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黄”，言汉宫黄额妆，也甚妙。俗士无知妄改，可恨。^[23]

前两句出自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题一作《上元》，或作《望日夜游》，但不知何本作《元夕》。虽然这首诗的标题和作者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是唐代的《大唐新语》《艺文类聚》，宋代的《初学记》《文苑英华》《苕溪渔隐丛话》，还是元代的《瀛奎律髓》，明代的《唐诗品汇》《石仓历代诗选》《诗薮》，均未出现“不惜夜梁镗，观卧美人诗”这样的异文(句)。真不知其“古本”从何而来！有意思的是焦氏所引的第二个例子“微汗欲沾裳”，云“古本作‘欲消黄’”，古本确实如此，但不知“欲沾裳”又依何本？梁镗此诗流传有序，在唐人选唐诗中已经选录：令狐楚《御览诗》作《美人春怨》，题下注“原题《美人春卧》”；芮挺章《国秀集》卷下作《观美人卧》；《唐诗纪事》和《文苑英华》作《古意》，各本均有数字异文，但“欲消黄”是一致的，没有异文，更没有任何版本作“欲沾裳”。焦氏云“俗士无知妄改，可恨”，真不知“可恨”的“俗士”又是何人！

明人徐《笔精》卷三“诗谈”“郎士元诗”条：

每读郎士元“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缘空”，末句又云“此心期与故人同”，重一“心”字，且费解。偶见冯元成《艺海洞酌》云，于朱太史家见宋本，此“心”作“他”时，于义了然，是以书贵古本也。^[25]

此诗在《文苑英华》卷二三五题作《酬王季友秋夜宿露台寺见寄》，《唐诗品汇》卷八六题作《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唐诗镜》卷三二与《全唐诗》卷二四八题作《题精舍寺》。徐氏所讨论第二句中的异文，《文苑英华》、明铜活字本《郎士元集》、《唐诗品汇》均为“心持”；但在刘克庄《后村集》卷一八四“诗话新集”引述时作“僧持”，《全唐诗》亦作“僧持”。但未见有“他持”，朱太史家宋本也不知为何本？当

然此处《笔精》所引，也可能是偶然的失误，或者是四库馆臣在抄录时出现了误字，将“僧”误作“他”。因为总体而言，徐氏《笔精》是一部较为严谨的著作，检索其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异文，基本上都有源可溯，仅有少数例外，如卷三“溶溶雨”条谈了一首宋诗：

世传晏元献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为警句。然溶溶水流貌，月不得名溶溶。予尝病之。近阅吴处厚《青箱杂记》云，“梨花院落溶溶雨”，始知“月”者后人改之，“雨”字自妙。^[25]

今查晏殊诸本及历代所选，该诗均为“溶溶月”，明稗海本《青箱杂记》卷五亦作“溶溶月”，并未见“溶溶雨”。难道徐氏所见真的有“古本”？难道这个“古本”未曾留下丝毫痕迹？又如卷三“唐诗误字”条：

邓泰素语予曰：尝见古本唐诗，“满寺枇杷冬着花”，“满树”作“满寺”；“近与单车向洛阳”，“近与”作“匹马”；“昨夜微霜初度河”，“昨夜”作“乍夜”；“驿路西连汉峙平”，“驿路”作“驿树”；“二水中分白鹭洲”，“二水”作“一水”，细味自得也。焦弱侯《笔乘》云，“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春香小洞幽”，“春香”作“香生”的对况，又有“砧声近报汉宫秋”之句，岂当复着春字耶？^[25]

不知邓泰素依据的是哪些“古本唐诗”。有些异文确如所言，但也有些异文主要见于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诗话，如《唐诗选》《唐诗品汇》《诗薮》等，对于徐氏而言可谓“近本”，完全算不上“古本”。“近与单车向洛阳”，出自李颀《寄綦毋三》，未见有“匹马”异文。“昨夜微霜初度河”，出自李颀《送魏万之京》，诸本均为“昨夜”，仅明代郭良翰《问奇类林》卷十八作“乍夜”^[26]。类书确有文献价值，但错误也同样很多，而且是孤证，不属“古本唐诗”之列。至于焦氏所云韩偓之作，其原载《焦氏笔乘》续集卷三“仙游观诗”：

韩翃《仙游观》诗：“疏松影落空坛净，细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对，又上句“砧声近报汉宫秋”岂当复着春字邪？^[23]

遍检诸本，不见“香生”异文，常见是“春香”“香开”“香闲”“香闻”，不知焦氏从何“古本”得见？

以“古本”为由改写唐诗的现象还有很多，此类做法导致唐诗增添了很多异文，而且又有“古本”障目，后人较易采信其言，故而也对唐诗的阅读和研究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三、杜撰“古本”的原因及其影响

历代学者对于“古本”的追求用“孜孜不倦”来形容,可以说毫不为过。冯班《钝吟杂录》卷四“读古浅说”云:“读书当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据。”^[27]杨慎尝言:“古书重刻一番,差讹一番。一苦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刀误,书所以贵旧本以此。”^[28]卷60但自明代以来,人们提到妄改古书,常常会想到杨慎。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为什么人们批评的火力点总是集中在杨慎身上?杜撰“古本”的行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一)杜撰“古本”的动机与原因——以杨慎为例

诚如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所云:“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然。”^[29]卷3 杨慎也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谈到古本的价值,那么他自己为什么还会杜撰“古本”呢?

从客观原因上来说,杨慎一生久在谪戍,身边书籍有限,多凭记忆录写诗文,难免会有偏差。杨慎自嘉靖三年(1524)贬谪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在边疆度过了三十五年。而且,《升庵诗话》是杨慎的朋友、门人从其《升庵外集》《丹铅总录》等著作中辑录而成,非杨慎特意撰修。杨氏一生著作等身,诗话中各条目写作于不同时间,时间跨度较长,是否每条记录都详加核实,也不敢断言。《四库全书总目·丹铅总录》论云:“(杨慎)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俚钉为编,祇成杂学。”^[31]1026 他仕途失意,发愤著书,写得多、刻得快,其间难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杨慎等学者杜撰“古本”还有多方面的主观原因。

一是“英雄欺人”。一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妄改唐诗,为了让人信服,常加上一句“古本作某”。莫砺锋先生说:“杨慎在诗话中所说的某某古本,往往出于杜撰……也完全有可能是杨氏自己认为此诗应该如此,故而假托古本中有所依据而已。”^[30]朱承平在《异文类语料的鉴别与应用》一书中多次指出张之象的妄改:“有些校书者,为了炫耀卖弄,在未能亲见古本用字的情形下,往往妄言古本字作某,为自己校改古书提供伪证,由此造成古书中的版本异文。如《盐铁论·忧边》:‘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张之象注曰:‘评,古本作平。’王利器说,张之象所谓‘古本’,本无是本,特欺人之语耳。这样的改动匪夷

所思,全不足取。”^[31]26 张之象(1507—1587)在校注古书时会杜撰“古本”,可以想见他在编著《唐诗类苑》时可能同样也会改动唐诗。如《唐诗类苑》卷一九一录《咏红苕》:“红苕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32]293 这首王维的《相思》确实有几处异文,但在张之象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咏红苕》标题,“红豆”也没有“红苕”异文。张之象将“红豆”写作“红苕”,绝非疏忽所致。如果是他的疏忽,或者是钞刻者的疏忽,只会将“红苕”写作“红豆”,而不是相反。《咏红苕》被《唐诗类苑》归属到“草部”,他可能以为《相思》中的“红豆”是草本科的植物,才在“豆”上加上“艹”头。杨慎等著名学者,才高学富,对于前人创作有不满之处,时或操刀删改,但有时也会隐而不言,托词“古本”即此,实如钱谦益所云:“(杨慎)窜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33]354

二是“假托以自重”。“古本”,也成了某些著名学者解诗的“秘密武器”。作为以渊博著称的著名学者,怎么能不解诗意呢?当他们遇到一些难解字词,或者认为某字不妥时,常用一个自己设想的字词来替换,又为了增加说服力,便云曾见“古本”作某字。陈耀文在《正杨》中多次质疑杨慎的此类行为。《丹铅总录》卷二“方城本萬城”:“《左传》‘方城以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讹尔。”^[34]《正杨》卷二质疑:“今剿旧籍以自夸,假古本以欺人,何耶?”《丹铅总录》卷十三“万岁夜”:“今本改‘夜’作‘后’,不见古人立言之妙矣。”《正杨》卷二:“此文自明,‘夜’字如何安置?岂所见又古本耶?”《正杨》中列出了很多质疑,虽然不尽合理,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杨慎为显渊博而杜撰古本,或为一己之见张目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三是“权威意识”。通过辩驳大家、名家之作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也是学者们杜撰古本的另一个原因。如《升庵诗话》卷一一“诗赋用字”条:

颜延年《赭白马赋》:“戒出豕之败驾,惕飞鸟之踣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诗:“大家东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将”字。白居易诗:“千呼万唤始出来。”“始”字不如“才”字。诗文有作者未工,而后人改定者胜,如此类多有之。使作者复生,亦必心服也。^[2]869

杨慎对颜延年、杜甫、白居易等诗中用字提出了质疑,并且加以了改动,对自己所改颇为自信。正如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所云:“用修好以攻杜为

事,似非其伦,愿与解人辨之。”《杜甫全集校注》卷十云:“浦辨甚是。”^{[35]2873} 杨慎讨论的对象多为李白、杜甫、王安石等名家,因为只有看到这些名家的不足或失误之处,才能彰显自己学识之卓绝;同样的道理,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说,提及杜撰“古本”等作伪行为时,后代学者们目光聚焦于名冠朱明一朝、号称最为渊博的杨慎身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杜撰“古本”之举也与社会时代学术风气有着密切关系。明代整体学风是较为粗疏的,很多伪书都出自朱明一朝;而且,在查证唐诗异文形成时间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唐诗异文都是从明代才开始出现的,然后经过清人的辩驳、考证,以及相互争论,使得这些原本不存在的异文流传得愈加广泛。再加上晚明时期,士人们高度追求自我,蔑视传统,他们不仅仅删改古书,还伪造古书。在这样的整体学术氛围之下,杜撰古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客观条件的局限,“假托以自重”等树权威、立标杆的“学者情怀”,以及炫博和“英雄欺人”的文人心理,再加上社会时代风气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可能是导致一些著名学者杜撰古本的主要原因。

(二)杜撰“古本”形成的“塔西佗陷阱”

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36]7} 这个理论在中国被称为“塔西佗陷阱”,一般多用于社会政治现象或被当作是一种政治学定律。“陷阱”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信力的丧失。杨慎等学者所说的“古本”,尤其是追求精确文本的经、史典籍,在不断被人证伪以后,彻底丧失了公信力,陷入了学术的“塔西佗陷阱”之中。

难道杨慎所说的“古本”都是其伪造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包括一些被历代大家所广泛质疑的“古本”,也有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下文略举几个典型案例。

其一,杜甫《游龙门奉先寺》的第五句“天闾象纬逼”,“闾”,又作“阙”“阅”“阔”“关”等。《升庵诗话》卷一“天闾象纬逼”云:

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闾象纬逼”,或作“天阙”,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闾”,引《史记》“以管闾天”之语,其见卓矣。^{[2]656}

陈耀文《正杨》卷四“天闾象纬逼”用大段文字证明杨慎所举的“旧本”是臆说,当为“阙”。实际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和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中对杜诗此处异文进行了详细考述,引用了诸多宋本中已经出现的“闾”“阙”并存的情况。杨慎所说的旧本作“天闾”,并非其杜撰,但他依然被后人所质疑。

其二,《升庵诗话》卷五载“李太白相逢行”条云:“此诗予家藏乐史本最善,今本无‘怜肠愁欲断’四句,他句亦不同数字,故备录之。太白号斗酒百篇,而其诗精练若此,所以不可及也。”^{[2]723-724} 这四句是:“怜肠愁欲断,斜日复相催。下车何轻盈,飘然似落梅。”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卷六对此有详细考述,采信杨慎所言,并为无法得见乐史旧本而惋惜^{[37]334}。但清代王鸣盛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蛾术编》卷七五“同纽字不可连押”在引述了王琦所论之后,云:“今案‘飘然似落梅’等句轻佻之极,断非太白原文。此必升庵所伪造,而嫁名于乐史传本者。王氏以之夹注于正文下,殊为无识。”^[7]而宋本《乐府诗集》卷三四“相和歌辞”收录了此诗,此四句已经赫然在列,且“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二句也在其间^{[38]1004};杨慎所说的“他句亦不同数字”,即王琦列举的异文,在《乐府诗集》中也均出现,或为正文,或为出校的异文。因此,即便怀疑李白《相逢行》曾为人所改,但也不能如此“冤枉”杨慎。

其三,《升庵诗话》卷二“王建宫词”云:“王建宫词一百首,至宋南渡后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绝句补入之。”杨慎不仅罗列了七首诗,还一一指明了作者或出处,然后又说“余在滇南见一古本,七首特全,今录于左……”^{[2]668}。杨慎依据其所说的“古本”补入了七首宫词,但却不为人认可,受到四库馆臣的指责。那么,这七首诗是否为杨慎所伪造呢?其实不然。宋代赵与时《宾退录》卷八中已经载有此滇南古本中的七首诗歌,并云:“今见于洪文敏所录《唐人绝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39]明代嘉靖刻本的宋代洪迈《唐人万首绝句》卷三一载《宫词百首》中也录此七首,即第28、30、45、83、91、92、100首^[40]。据此可知,杨慎所补的七首宫词早在宋代已经出现,不可能是他伪造的,他所说的“古本”也就不一定是纯属杜撰了。

托古本欺人,并非杨慎肇始,也非杨慎而终;虽然杨慎有不少考辨完全是正确的,但杨慎时时被人

当成是“好伪造古书”的典型,其原因主要在于失信于人矣。

(三) 杜撰“古本”所产生的影响

明代王嗣奭有一部杜诗评本——《杜臆》,这部书解读杜诗时有发明,颇受杜诗研究者的推崇。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研治杜诗时都大量引用《杜臆》的内容,且给予较高评价。莫砺锋先生说:“总的来说,《杜臆》是学术水准很高的、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的一个清代杜诗注本,为清代的杜诗学开了一个好的源头。”^{[41]94}但大家注意不多的是,王嗣奭在《杜臆》中对杨慎表现了极高的信任,与钱谦益《钱注杜诗》完全不相信杨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对于杨慎添加杜甫《丽人行》的两句,《杜臆》卷一云:“此真不可少,《诗归》从之。”^{[42]24}又如,《杜臆》卷二《元日寄韦氏妹》:“‘春城’,用修亦定为‘秦城’。”^{[42]45}明显赞同杨慎之说。但经过翻检杜诗诸本,均为“春”,无本作“秦”。检索《杜臆》全书,其中二十余次提及杨慎,只有二次明确表示不赞同杨慎所解^①,其余凡是杨慎所云“古本作某”,王氏皆赞同。《杜臆》的严谨是显而易见的,凡王嗣奭自己所说的“古本”几乎都能查到依据,不是凭空而言,但他对杨慎的盲信与推崇,实在让人费解。可能主要是摄于其威名。这也正见杨慎影响力之所在。

其他学者杜撰古本有没有产生影响呢?前面提到的《唐诗类苑》将王维《相思》中的“红豆”改成“红荳”,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一〇三《相思》的首句就沿用了“红荳”。《唐诗类苑》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唐音统签》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红荳”异文极为罕见,很难说胡氏没有受到张之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张之象改动以后,将“红荳”划属“草本”,无意之间为后人的“红豆之争”埋下了伏笔;而且也影响到该诗第二句一处重要异文的讨论,“春来发几枝”,是“春”还是“秋”?争论颇多,草本红豆春华秋实,怎么会“秋来发几(故)枝”呢?这恐怕是引导人们将“秋”改为“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杜诏《唐诗叩弹集》卷四在选录《丽人行》时就将杨慎所添加的两句补入诗中,钟惺《唐诗归》中也多处从杨慎“古本”之说,等等。

由此可见,杜撰古本的行为对后人阅读、理解和研究唐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有不少唐诗异文就是这样形成的。

四、面对杜撰“古本”而形成异文的学术反思

前代学者在诗话、笔记、选本等著作中杜撰“古本”而形成的异文,数量不少,且有些经过历代辗转传钞已经进入到唐诗的文本系统之中,那么应该如何科学对待这些异文呢?

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辨伪,弄清楚哪些“古本”是杜撰的,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地说,不能将前人所说的“古本”一棍子打死,大部分严谨的学者所说的“古本”多是有依据的,他们没有准确地说明来源出处,主要是由于古代传统学术通行的做法造成的。如前面提到《杜臆》中王嗣奭自己所说的“古本”可信度就非常高。又如刘禹锡《淮阴行五首》其五:“隔浦望行船,头昂尾嚶嚶。无奈挑菜时,清淮春浪软。”“挑菜”,底本作“脱菜”,校“脱,一作挑”,明本作“挑菜”,《丛刊》本作“洗菜”,《全唐诗》作“晚来”。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黄鲁直云《淮阴行》‘无奈脱菜时’不可解……余尝见古本作‘挑菜时’。东坡惠州新年诗‘水生挑菜煮’,恐用此字。”清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二选入此诗,引周必大所论,以“挑菜”为是。《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云:“按刘禹锡《送景玄师东归》亦云‘滩头蹑屐挑沙菜’,则作‘挑’是,据改。”^{[43]19}此处《二老堂诗话》中的“古本”可信度非常高。

陈耀文《正杨》“有意求瑕,诋謫过甚”^{[3]1026}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丹铅总录》评价杨慎云:“然渔猎既富,根柢终深,故疏误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3]1026}丁福保《重编升庵诗话弁言》云:“王弼州讥其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陈耀文且有《正杨》之作以诋之,后学或引以病升庵。然升庵之才器,实在有明诸家之上,瑕玷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1]634}此二者客观评价了杨慎的成就及其不足。嵇文甫先生也说:“当明朝中叶,固然是‘心学’盛行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时候,为后来清儒所大

① 一是《杜臆》卷一《重过何氏五首》第三首:“赵子常云,两游皆当夏月,‘春’必‘熏’字之误,用修亦定为‘熏’。但与落日不相应,余以为当作‘清’,‘清’与‘春’音近而讹也。”二是《杜臆》卷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然杜实自道山东李白,用修定为‘东山’,谓白素以谢安自比,恐是臆说。”

大发展的考证新学风逐渐萌芽了。这里首先打开风气的首要杨升庵。……虽疏舛伪妄在所不免,但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自此启。”^[44]至于陈耀文之后,杨慎的孙子杨宗吾又作《检蠹随笔》三十卷,其中有数条专门驳陈氏之非,其书杂乱舛误之处颇多,受到包括四库馆臣在内的众人非议。此类做法更是不可取的。

当然,更没有必要为作伪者开脱。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白乐天《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杨用修改‘始’字为‘才’字,且谓作者亦必心服。徐兴公谓毕竟‘始’字为妙,况‘才’来一韵尤碍。余谓用修惧后人作恶谗耳,非谓‘才’字胜‘始’字也。”^[45]这可以看作是在为杨慎开脱。

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此类异文是不二选择,可以讨论,可以存疑,但无须掩饰,不能盲从。《韩集举正》“引校‘古本’六十八条,方氏(按,方崧卿)遵从者六十条”^[46]⁵⁷⁶。方崧卿并没有全部遵从“古本”,而是经过搜检爬剔来决定文字的取舍。这是值得称道的校书方法。前引杨慎云杜诗古本“野艇恰受两三人”中“艇”字有平音,为人妄改作“航”。清代大学者俞樾云:“‘艇’音‘廷’,杜用此音也。按此未知可信否,姑广异闻。”^[47]续钞卷14 对于自己无法确定的问题宁可存疑,也不盲目抉择,这正是科学的态度。

对于作伪者,也不能全盘否定。无论多少人批评杨慎,他的著作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胡震亨指出了杨慎著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但依然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唐音癸签》卷三二云:“明兴,说诗者以博推杨用修,以雅推徐昌谷,以隽推王弼州。用修之书,搜隐摘奇,往往任胸援引,非必尽确,后贤訾驳正未已。”^[6]³³³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伪材料也有其真价值的一面,所谓“知其伪而不能废也”。冯班云:“又有古书宋人以为伪者,却自可用(如《山海经》之属),不必以宋儒之说为疑也。”^[27]卷四 前人对待伪书尚能如此,我们对待杜撰的“古本”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改?还应该看到,即便是杜撰的“古本”,也确有一些文字经过这些著名文人改动之后是胜于原作的。

清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八引明人薛千仞云:“用修过目成诵,故实皆在其胸中,下笔不考,误亦有之;然无伤于用修。好事者寻章摘句,作意辩驳,得其一误,如得一盗赃,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45]虽有此辩、此讥、此诚在前,但我们依然不

得不面对现实,毕竟杜撰古本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对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更无意于否定杨慎等著名学者,仅揭发此类现象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不能迷信权威,不能迷信“古本”,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索古籍异文产生、演变,到为人所接受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毛奇龄. 西河诗话 [G]//西河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 [2]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王世贞. 艺苑卮言 [M]//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胡震亨. 唐音癸签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7] 王鸣盛. 蛾术编 [M].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世楷堂刻本.
- [8]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9] 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 [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9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0] 阎若璩. 潜邱札记 [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5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杨慎. 升庵诗话新笺证 [M]. 王大厚, 笺证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2]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3] 钱泳. 履园丛话 [M]. 清道光十八年(1838)述德堂刻本.
- [14]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M]. 清光绪康氏万木草堂刻本.
- [15] 胡震亨. 唐音统签(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16] 陈耀文. 正杨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刘学锴. 唐诗选注评鉴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
- [18] 詹锼主编.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 [19]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 [M]. 民国吴兴丛书本.
- [20] 郑明选. 郑侯升集 [M].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文震刻本.
- [21] 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2]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3] 焦竑. 焦氏笔乘 [M].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与栋刻本.
- [24] 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5] 徐枋. 笔精 [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5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6] 郭良翰. 问奇类林 [M].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黄吉士等刻增修本.
- [27] 冯班. 钝吟杂录 [M]. 清嘉庆借月山房汇钞本.
- [28] 杨慎. 升庵集 [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7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9] 王应奎. 柳南随笔 [M]. 清借月山房汇钞本.
- [30] 莫砺锋. 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 [J]. 文学遗产, 2007(2): 159.
- [31] 朱承平. 异文类语料的鉴别与应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 [32] 张之象. 唐诗类苑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33]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4] 杨慎. 丹铅总录 [M].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梁佐校刊本.
- [35] 萧涤非. 杜甫全集校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36]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历史 [M].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37] 王琦. 李太白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8] 郭茂倩. 乐府诗集 [M].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景宋本, 1955.
- [39] 赵与时. 宾退录 [M]. 宋刻本.
- [40] 洪迈. 唐人万首绝句 [M]. 明嘉靖刻本.
- [41] 莫砺锋. 杜甫诗歌讲演录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42] 王嗣奭. 杜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43] 陶敏, 陶红雨.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 [44] 嵇文甫. 王船山学术论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45] 周亮工. 因树屋书影 [M]. 清康熙六年(1667)刻本.
- [46] 方崧卿. 韩集举正汇校 [M]. 刘真伦, 汇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 [47] 俞樾. 茶香室丛钞 [M].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春在堂全书本.

[责任编辑: 吴晓红]